



Culture&History

浣花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 图据新华社

蜀刻本

一页传千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供图 彭雄

1 造纸、印刷 四川文化的“并蒂双莲”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造纸术和印刷术，更是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让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历史典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也为人类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使得这一轻便易携、经久耐用的文字载体得以传播，到了三国时，造纸区域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西晋时纸张慢慢普及，并渐渐淘汰了简牍。两晋南北朝时，成都就已经开始造纸。到了唐、五代时期，成都的造纸业已经闻名天下，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当时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政府

的官方用纸。李肇《翰林志》记载，唐朝公文限用蜀产黄麻纸和白麻纸书写，并须按不同的用途分别使用，不得相混。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明确指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当时成都的造纸业主要集中在浣花溪畔。司马光《送冷金箋与兴宗》描述说：“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沔为纸，莹若裁珉琳（美玉）。”当时仅浣花溪一带就有数十上百家造纸作坊，足见成都造纸规模之大。唐代女诗人薛涛，就曾在浣花溪畔制造出了闻名天下的“薛涛笺”，堪称世界造纸史上的一大创举。

造纸业的兴盛，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成都成为唐宋时名副其实的

“书香之城”。中晚唐时，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孙柳玭到了成都后，就在成都大规模淘书，他在《柳氏家训序》中记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可见当时成都城内的书籍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造纸业的发达，催生了成都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在成都这块文化高地上，盛放出了一支美丽的并蒂双莲。唐代时剑南、两川版印历书行销天下，白居易曾感叹“诗家律手在成都”，诗人的文集为当时的畅销书，而唐代以来“天下诗人皆入蜀”。

唐代成都印刷业的发达还有另一个有力佐证，1944年，成都望江楼出土的唐墓中，出土了一幅约一尺见方的茧纸刻印《陀罗尼经咒》残片，上面竖镌了一行汉文：“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口口口近卞口口印卖咒本口口口”。从此可以推断，此印本应在设置成都府（757年）之后不久，比发现于敦煌、现存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上

最早的书籍”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剛经》还早。《陀罗尼经咒》原物现存中国博物馆，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收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事实上，无论是《陀罗尼经咒》，还是《金剛经》，在书籍中多处都注明了“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这无疑确定了其“蜀刻本”“成都造”的身份。《陀罗尼经咒》中所记载的“龙池坊”，据考证就在今天的成都春熙路一带，唐代时就是书籍汇聚之所，20世纪末，春熙路的“龙池书市”依然是成都爱书人淘书的胜地。

中唐时，成都已成为全国印刷业最繁荣的地区，蜀地私家刻印的历书在各地市场上出售，其销路不仅遍布全国，更是随着国际交流，走向了世界。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日本僧人宗睿留学中国，携带回日本的若干杂书中，就有“西川印子”《唐韵》五卷和《玉篇》三十卷各一部。除了日本外，“成都造”的“蜀刻本”还传播到了朝鲜、东南亚以至西方各国，让“西川印子”名满天下。

宋代之后，明代与清代的蜀刻本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蜀刻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古籍文献收藏家彭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宋代蜀刻本之所以珍贵，能够成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收藏之一，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本身具备的极高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宋刻本书籍内容丰富，记录全面，为后世打开了一扇了解宋代四川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的窗口，也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在后世，宋代蜀刻本被图书收藏界视作价值不菲的绝妙艺术珍品，也被历史文化学者奉为宋史研究的“宝藏”。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国内保存的宋代蜀刻本并不多。据统计，国内的宋代雕版印刷古籍在700本左右，这些珍贵的古籍被妥善地保存在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如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摩诘文集》《孟浩然诗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张承吉文集》。此外，日本还收藏有《李太白集》。

蜀刻本的珍贵，早在明代时就已经有所体现，当时的宋代蜀刻本就已是“一纸值千金”。为何时隔仅百余年，能够“一纸传千年”的书籍就如此稀少且宝贵？这主要还是因为宋末元初的战乱，对四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文化具备坚韧与脆弱双重属性，大量宝贵的书籍在战火中被毁于一旦，文化的断代也让蜀刻本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终明一朝，四川的文化也未能恢复到宋代的高度，但明代的蜀刻本却依然延续了部分宋代蜀刻本的风采。比如书籍印刷依旧精美、部分书籍还留有印工的“印记”，少量书籍仍坚持使用昂贵的麻纸、依然继承了官刻、家刻、坊刻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明代的蜀刻本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革，如明蜀刻本采用的纸张逐渐从麻纸过渡到了性价比更高的竹纸、字体比宋蜀刻本有所缩小、每一页承载的内容变多等，此外，明代蜀刻本在内容上也有所拓展，如生活类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医学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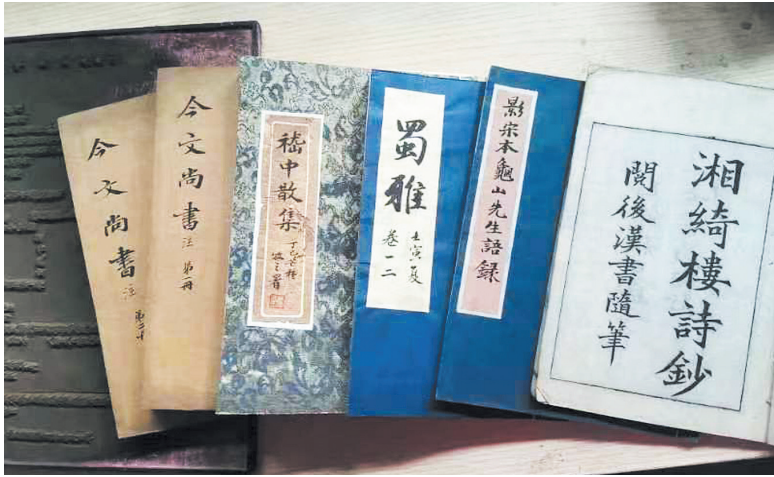
类的《医要集览》《养正图解》等书籍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明代刻本的文化覆盖范围。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汇入，为四川带来了更多元化的文化结构，同时也冲击着四川原本的文化基底。清代四川的书籍，多了几分共性，在书籍的呈现上，愈发靠拢当时社会的主流。比如书籍的纸张全面过渡到竹纸，印刷字体转为规整但缺乏个性的“匠体”，单页字体更小、承载内容更多等，从清代开始，四川刻本逐渐分离了收藏品的属性，向着更纯粹的印刷品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名臣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后主持建立了“尊经书院”，丁宝楨主政四川时，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这所书院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名人，包括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今文学大师廖平；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驥等等。同时，尊经书院还主持镌刻了一大批高品质的刻本，据黄海明在《概述尊经书院的刻书》一文中统计，大约99种（含丛书2部，若将子目视为单种计，为119种），1912卷，22703块书板。尊经书院刻书多以经史词章为主，也有少数科技类书籍和反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进步书籍，由于品种丰富，校勘精审，质量上乘，深受士人学子追捧。

此外，成都书局刊刻的《相台五经》《御纂七经》《经典释文》、股本“前四史”、《新五代史》等一大批经典典籍，字大板朗，刊刻精细，也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过去、面向现在、展望未来。蜀刻本历经唐宋元明清，它不仅见证了四川天府之国曾经的辉煌，也记录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往昔，内中蕴含的文化与智慧，不仅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历史的窗口，更为今人提供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扫一扫
更精彩

2 成都、眉山 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

宋代时，成都的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达到了古代的巅峰，以至于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蜀刻本成为后世千金难求的珍品。但实际上，在宋代之前的五代十国，成都的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就已经进入了第一个腾飞期。

五代十国时，各地割据势力混战之时，在四川建立的前后蜀政权却凭借着地理环境的优势以及保守稳健的政治态度，得以远离战火，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再加上前后蜀政权大力提倡和扶持印刷出版，客观上促使成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

在前后蜀时期，后蜀宰相毋昭裔无疑是推动四川雕版印刷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人。毋昭裔因幼时家穷，借书于有书之家，常受白眼，于是发愤有钱后一定要广印书籍。他为相后，就主持雕版刻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这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古代第一批刻印的文学总集和类书。为了保证刻印的质量，他还将书写与雕刻分开，变成两道工序，由名家书写、精工雕刻，打破了以往文人轻视印本书的习气。毋昭裔也被誉为“后世刻书之先驱”。

宋末后蜀之，毋昭裔之子毋守素将毋昭裔所刻的书版，献给了北宋朝廷，此后再一印刷，为蜀地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毋昭裔刻本所具备的优秀品质也被后来的宋代刻本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蜀本的考考也成就了后世的“宋本之精”。

两宋时的成都，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因此也催生了文化在天府之国成都的蓬勃发展。蜀地当时有“人文之盛，莫盛于蜀”的美誉。两宋时，四川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大家，最著名的当属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以及范祖禹、魏了翁、张栻等人，他们的文化作品，为刻书业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当时四川的雕版印刷业有两大中心，其中成都是北宋时期的蜀刻中心，眉山是南宋蜀刻的中心，有“成都本”和“眉山本”之说。此外，邛州、嘉州（今乐山）、威州、三台、南充、资州、叙州、内江、宜宾、泸州、重庆等都有刻书。因为它们都地处巴蜀大地，因此也被认为是广义上的“蜀本”。不过这当中，又以“成都本”和“眉山本”最为有名。

宋代蜀刻本之所以具备令后世为之惊叹的高品质，主要还是因为刻印的主体大大拓展的原因。与唐代刻印书籍主要是民间所为不同，宋代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其中，官刻书籍的品质最高，它们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组织的印刷出版，内容主要以佛教著作、经史典籍和大型类书为主。宋代时，官方至少在四川组织了四次大规模印刷出版活动。如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派人到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这套印刷品共有1076部、5048卷，约4860万字，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四川也不负众望，将蜀刻本精致考究、经久耐用的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刻本印刷出来的印刷品，还被官方送给了日本、高丽、越南等地，这些国家又据此标准予以翻刻、仿刻，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此外，成都的地方政府也多次组织官刻，如北宋成都知府吕大防主持刻印的《华阳国志》，南宋四川转运使并宪孟主持雕刻的《宋书》《魏书》《梁书》《南齐书》《北齐书》《周书》《陈书》，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主持刻印的《太平御览》等。

在官刻之外，成都的私刻也丝毫不逊色，这些私刻本多采用精选本，校订细致，质量很高。如成都人彭乘就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有“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之说。

宋代的成都，城内书坊林立，有数百家之多，它们大多以刻历书、经咒、杂书等实用性图书为主。此外，在一些大型书坊里，还刻印经、史、子、集和唐宋文集等畅销书，特别是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元稹等文化名人的文集，在当时可谓一书难求。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成都印刷历书，印制于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和文化遗产的金种子，版本铭记着中华民族诞生、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中国国家版本馆，正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

中国国家版本馆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作为存放保管文明“金种子”的“库房”，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存放了不少和四川相关的珍贵古籍、文物等。据了解，四川共提交重点征集版本735种，其中重点出版物729种，包括展示书目710种、地方文库和古籍丛书2种、新中国出版物17种，以及古籍文物等展厅展品6种。其中《抱朴子》（明抄本）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1册）存二卷（一百七十五至一百七十六），《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八十五卷，共3部古籍，均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四川古籍精品。

宋代蜀刻本，是众多四川元素版本中具有极高价值的藏品。宋代蜀刻本版式疏朗明快，一页栏数9—12栏不等，其字体以颜体和柳体为主，字大如钱，字迹清晰，刻印精美，因为其经久耐用的属性，成为收藏传世的精品。2020年12月2日的一场拍卖会上，宋代出版的王安石文集、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和《宋人佚简》三卷，以2.6335亿元人民币成交，成了目前最贵的古籍。事实上，宋代蜀刻本在明代时，就已经是一页千金，有“寸字寸金”之说。

如今的宋代蜀刻本，大多收藏于国家级的博物馆之中，在千年之后，依然展现着古时成都“书香之城”的灿烂，中国国家版本馆中收录的这些“四川元素”藏品，它们的价值不仅体现本身的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古籍，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拼图”。



明代蜀刻本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